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
晓
京
编

罗家伦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
晓
京
编

罗
家
伦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罗家伦卷/张晓京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8617-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罗家伦 (1897~1969)-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095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罗家伦卷

张晓京 编

Luo Jialu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9.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71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

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1897 年生于江西南昌。四岁发蒙，就学家塾。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就读美国传教士所办英文夜校，开始学习英文。1912 年随父亲从江西返回祖籍浙江绍兴。1914 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开始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罗家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且热心社会活动，曾为《复旦》季刊的编辑，所撰《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一文曾被上海报纸转载。

1917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北大时期的罗家伦在学问方面“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常常“跨系选课”，并时常去胡适家中“请教受益”。1918 年 6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6 期“易卜生专号”出版，刊印了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著《娜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8 年夏，与傅斯年、徐彦之、俞平伯等筹组“新潮社”，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编辑发行专门刊物，倡导新文化运动。罗家伦提议将该杂志中文名称定名为《新潮》。“新潮社”成员基本为北大学生。成立之初有社员 21 人，最多时达三十余人。根据“新潮社”的组织章程，设编辑与干事两部，编辑部主任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为编辑。傅斯年出国留学后，罗家伦接手其工作，主持《新潮》的编辑事务。从 1919 年 1 月 1 日《新潮》出刊，到 1920 年秋罗家伦赴美国留学，杂志编辑易手为止，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论文、演说记录、评论、书评、诗歌、通信等各种体裁的文章 36 篇，是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位“主笔”。

1919年，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罗家伦和他的同学们由“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的书生议政，转而采取实际的行动，并因此成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0年秋，经蔡元培校长推荐，罗家伦获得穆藕初奖学金资助，与段锡朋、汪敬熙等人赴美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荣誉奖学金。1921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哲学及思想史。1923年冬赴德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月余即加入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总司令部参议、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时年32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1930年5月，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武汉。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1932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1年7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1943年2月，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巡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同年4月宣誓就任新疆监察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馆降旗撤馆，罗家伦即返回台湾。回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革命文献》等大型文献资料丛书。1969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

在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人们谈及罗家伦、研究罗家伦一般都是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褒贬臧否，而恰恰由于作为一个政治人的罗家伦很早就投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为其统治服务终身，因此也就脱不掉“帮凶”的命运。及至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以学术研究的话语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左的”、“右的”或“中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家伦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但依然不是大家感兴趣的“热点”或“焦点”。无论从事功抑

或思想而言，在中国大陆罗家伦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读”的历史人物。

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生平，73年的生命历程，成长求学，步入政界，其政治生命与言论事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以自己的学术背景或文化人身份进入到“体制内”甚至是被“体制化”了，成为“专家型官僚”的典型，对于罗家伦政绩与思想主张的梳理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期的罗家伦和以“教育救国”的愿景与实践为主体的文化观。

二

美国华裔学者张灏曾将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时间的中国称为转型时代，认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①。“这样的大转折时代并不多见，除了春秋战国和魏晋，就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②罗家伦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他的思想变迁也充分反映了时代大潮的起伏跌宕。1917年秋，罗家伦考入新文化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他以《新潮》为阵地，热烈地拥抱新思潮，激烈地批判旧传统，倾心创造新文学。在爱国运动的狂飙中，他揭竿而起，投入争取国权的斗争，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群体中的一员。而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则成为罗家伦“立言”、“立功”的第一个大舞台和精神家园。正如国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陶希圣所言，“五四这个时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业的发轫时期”^③。

1917年秋，罗家伦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这个思想活跃，以“二十世纪新学生”相标榜的年轻人深受新思潮的鼓动，入学第一学期“便

① 张灏：《思想与时代》，1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②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1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③ 陶希圣：《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几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十三卷第一期，10页。

向最具前卫性的《新青年》投稿”^①。1918年元月号《新青年》还刊出了罗家伦用文言写的《青年学生》一文。同年6月，他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刊出，这是罗家伦第一次使用白话文。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出版。这份学生刊物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探讨中国社会“因革之方”，激发人们对于学术的兴趣，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与人格为责任。可以说，无论从《新潮》的创办者赋予它的基本精神，还是它所发表文章的基本倾向来看，《新潮》的旨趣与早期陈独秀的思想主张是十分契合的。罗家伦自己曾这样评价道：“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因此，“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但比较而言，他认为“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②。

综观罗家伦发表在《新潮》上的30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对封建传统道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无情抨击，他主张通过西方文化的推介与普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强调“文学革命”的本意并非仅仅在于普及“通俗教育”，而是要确立“人的文学”。他的文章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新潮》“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的编辑方针。首先，关于“批评的精神”。罗家伦将“批评”作为向旧世界宣战的有力武器。他认为，“批评这件东西，实在是改革思想、进促现状的妙品”，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书籍方面的批评可以祛除“顽固不合科学的思想”，“指导一般的国民”，免得青年人上当。当然，也可以看出，罗家伦对旧中国、旧文化的批评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同时，他对《新潮》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本定位的，即这种批评尽管不乏火药味，但是是对“学问的讨论”和“真理的研究”，即使是批评社会现象，也是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并希望所提的建议能够得到社会的“采择”。第二，关于“科学的思考”。罗家伦认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是思想可以上轨道的前提。科学的方法论是改中国人“糊涂脑筋”为“科学脑筋”的利器。最后，关于“革新的文词”则主要体现在对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与身体力行。罗家伦不仅在

① 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②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76页，《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

《新潮》上发表文章，阐发“文学革命”的思想，而且还从事文学创作，诗歌与小说均有涉猎。

罗家伦不仅是一位热烈呼唤新思潮，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造的“弄潮儿”，也是一位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的“实际的人”。与他的好友傅斯年不同，在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发起、组织和宣传的工作，“始终是主角之一”^①。在参与实际工作的同时，他也开始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进行分析和阐释。早在1919年5月26日，他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认为这三种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当然，罗家伦也敏锐地觉察到学生运动的严重局限性，认为单纯的群众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并不能达到青年学生们所追求的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目标，使中国走上文明、民主之路是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罗家伦“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基础”的信念。

“近代中国宛如一座云雾萦绕的历史迷宫。当知识者们怀着救世的热忱跨入它的大门，去探寻通向光明的出口时，他们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②在被鲁迅形象地比喻为“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的近代中国，新旧思想的交锋尤其激烈。知识青年在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面前，也表现出了他们选择的不确定性。北大时期的罗家伦从热烈地呼唤新思潮，讴歌十月革命到最终接受实验主义；从赞同社会主义，主张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提倡“应用社会主义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③到倾慕西方民主制度，主张为思想自由而作“真理的牺牲”；从激烈地反传统，抨击中国文学一无是处，到承认文学革命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西方文学也应“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东西文明融合论”，五四时期罗家伦的思想恰如时代潮流的变化一样，异彩纷呈，瑕瑜互现，卓见与局限并存，而其思想的最后转型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简单地用意识形态的“左”与“右”来关照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失之偏颇而难于重现当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真实面貌。

①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199页，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②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2版，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③ 志希：《解放与改造》，《新潮》第2卷第2号，《书报评论》，361页。

三

著名学者欧阳哲生曾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和著名大学校长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知识领袖型，如蔡元培、胡适，因其在知识界的特殊声望而获得人们的尊重，但于管理校务方面却采“无为而治”方针，行政能力似令人“不敢恭维”。二是学者官僚型，如朱家骅、蒋梦麟、罗家伦，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更有与国民党的特殊关系，国民党的党性色彩比较浓厚。三是职业干练型，以张伯苓、梅贻琦、傅斯年最为典型，他们的党派色彩相对淡薄，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以教育为职守，属于比较纯粹的教育家。^① 罗家伦学生时代的好友傅斯年曾经预言过他的《新潮》同仁们的职业取向，不出教育界与出版界，这个预言得到了相当的应验。罗家伦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服务于教育界，按时间顺序先后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1927年5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到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第二段，1928年8月21日到1931年1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第三段，1932年8月至1941年7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负时誉”的时期。他的学生也认为，罗家伦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但更是一位教育家，他对于国民党最大的贡献即在教育方面。^②

罗家伦关于教育问题的言论，大多数并不是来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是来自他对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演讲。这些演讲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对大学理念的理解，特别是对国立大学地位与作用的基本界定。最能代表罗家伦大学理念的两篇文献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时的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另一篇为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对全校教职员的演讲《中央大学之使命》。

正如著名哲学家，罗家伦到清华后最倚重的教授之一冯友兰曾经说过的那样，“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③，因此，他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强调了这所学校对于新政权的“文化意义”，“这回国民革命军收复北平，是国民革命力量澈底达到黄河流域

① 参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② 参加马星野：《悼罗志希先生》，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592页。

③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国民政府于收复旧京以后，首先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北方为国家添树一个新的文化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①很显然，罗家伦是从国家独立、文化平等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阐释大学的基本任务或曰大学的使命的。

对于什么是“学术独立”，罗家伦进一步阐述到，作为国立大学既要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同时又要充分接受西洋的科学文化，所不同的是，接受的方法“不是站在美国的方面，教中国的学生‘来学’……乃是站在中国的方面，请西方著名的，第一流的而不是第四五流的学者‘来教’。请一班真正有造就的学者，尤其是科学家，来扶助我们科学教育的独立，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在清华园里，不，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壤上，使他开花结果，枝干扶疏”^②。

恰恰是基于追求“学术独立”的考虑，改制后的清华大学不再走培养“他人的学术学徒”的路子，停止了全部毕业生留学美国的做法，改为以公开考试的办法，选送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赴美留学，而学校则以培养本地人才为主，使清华大学正式入于国家的教育系统。

强调“学术独立”是罗家伦教育思想的起点，他的大学观或曰教育观是与他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罗家伦的大学理念是其文化观的反映。和相当一部分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同，罗家伦更多的是从民族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论述他对大学教育、大学使命的理解的。对“教育”的特殊界定，对中国教育的批判性认识是罗家伦构建他的所谓“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而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概念的提出见诸他出任素有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学”之称的中央大学校长后所做的一系列演讲。这一理念继承此前他本人关于“学术独立”的思考，揭示了罗家伦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大学使命的独到认识。

罗家伦把他的教育追求概括为“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18～19页。

②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19页。

“办理大学不仅是来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正因为国立大学承担着“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为民族求生存，使国家学术得以永久发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发”^①的伟大使命，所以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的办学目标就是要使其成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②，他希望中央大学的师生时刻把民族的存亡这一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他认为，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继续不断地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民族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办理中央大学的十年，恰是中华民族国难深重的十年。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激发起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局面，正和昔日的德意志在普法战争失败之后的情形类似。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柏林大学教授，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军压境，国内人心涣散的危急时刻，克服种种障碍，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篇演讲作为其《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续篇，说明德意志民族过去所处的那第三个历史时期，即恶贯满盈的状态，由于自私自利发展到了极点，已经自己毁灭了自己，德意志民族当时面临的历史使命，是要建立崭新的民族教育体制，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公民，通过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过渡到人类社会的第四个历史时期，即理性科学占支配地位的状态，在各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表率的作用。1808年5月中旬，《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出版，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费希特的这一演讲由于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公认为是一部“光辉的爱国主义篇章”而被载入史册。罗家伦十分欣赏费希特的这一做法，不仅多次在对学生的演讲中提到，而且身体力行。当中央大学在日军炮火轰炸下不得不迁至陪都重庆继续办学的时候，罗家伦在迁校后重庆沙坪坝校区每周向学生演讲一次，演讲词由杨希震及韩德培记录，经其亲自审阅修改后

^① 罗家伦：《提高学术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232～234页。

^② 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243页。